



Fudan American Review

美国问题研究

2012/1 (总第十四期)

- 郝雨凡 用大战略思考中美关系
- 刘永涛 美国国会、奥巴马总统和“战争权”之争
——以美国军事干预利比亚为例
- 宋国友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问题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唐志磊
- 张 磊 论美国军事介入中日与中菲岛屿争端的可能性
——以军事同盟条约为视角的比较研究
- 岳汉景 撤军后美国 展望
- 郭永虎 20世纪70年代美国人权外交政策形成新探
薛 丹
- 肖卫兵 从信息流通视角评析奥巴马政府信息公开政策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世界出版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美国问题研究. 14 / 沈丁立主编.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2.11

ISBN 978-7-5012-4377-8

I. ①美… II. ①复… III. ①美国—研究 IV. ①D7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256030号

责任编辑 罗养毅
责任出版 刘 喆
封面设计 嘉 维

书 名 美国问题研究 (总第14期)

Meiguo Wenti Yanjiu

主 编 沈丁立

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址邮编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51号 (100010)

网 址 www.wap1934.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排 版 北京世知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京晟纪元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印张 787 × 1092毫米 1/16 12¼印张

字 数 222千字

版次印次 2012年11月第一版 2012年11月第一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012-4377-8

定 价 23.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特约文章

- 用大战略思考中美关系 /1 郝雨凡
- 美国国会、奥巴马总统和“战争权”之争
——以美国军事干预利比亚为例 /16 刘永涛

专题文章

-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问题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29 宋国友 唐志磊
- 论美国军事介入中日与中菲岛屿争端的可能性
——以军事同盟条约为视角的比较研究 /47 张 磊
- 撤军后美国与伊朗在伊拉克的博弈展望 /69 岳汉景
- 20世纪70年代美国人权外交政策形成新探 /86 郭永虎 薛 丹
- 从信息流通视角评析奥巴马政府信息公开政策 /101 肖卫兵

-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独立性研究 /116 殷夕婷 赵可金
- 美国气候政策变化分析
——基于政党竞争的视角 /137 戚 凯

- 排队：非典型市民社会的一种微观法学体察
——评《看不见的法律》 /155 李立丰

学术交流

- 第六届“美国的战略走向与中美关系”学术研讨会综述 /164 蔡翠红

特约文章

用大战略思考中美关系

郝雨凡^①

【内容提要】 中美关系已经步入不稳定期。随着两国精英层对彼此的猜疑不断加深，美国对华强硬政策有常态化趋势。中国该如何应对？从大战略高度寻求战略突破，已经迫在眉睫。本文讨论中国外交大战略的目标、对手、应对可能挑战及困难的对策和战略步骤。本文认为，中国大战略目标是崛起，是建设民富国强且和谐稳定的现代国家，而非赶超美国，称霸世界。中国的崛起并不是一定会发生的历史必然，相当一些国家在现代化崛起过程中失败退场。对美关系应从三个战略层次上思考：首先要制定灵活、智慧而又宽泛的对美政策机制，即能有利于改善关系又不损害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第二要从顶层设计，扩大中国势力范围，在亚洲乃至全球构建中国关系网。第三中国崛起最大挑战来自国内，必须加速国内改革、转型和提升，在深化经济改革的同时，改变社会治理方式，从社会公正、公共福利等方面全方位提升社会治理水平，加固内部和谐稳定，保证崛起的内在动力。

【关键词】 中美关系 外交大战略 和平崛起 周边外交 深化改革 社会治理

① 郝雨凡，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及人文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

最近两年,中美关系险象环生。美国不仅军事战略重点东移,剑指中国,而且正动用巨大的政治和外交资源施压中国。虽然习副主席成功的访美稍微缓解了双边关系的紧张,但中美关系已经真正步入了不稳定期。2012年美国总统大选和中国高层换届都为中美关系的前景增加了不确定性。随着两国精英层对彼此的猜疑不断加深,不仅任何意外事件可能影响两国关系的走向,未来两国国内政治发展和经济走势,都会对当今世界这一对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投射不容忽视的变数。

2009年初,奥巴马总统就任之初,中美关系一度温暖如春。深陷金融危机中的美国需要中国的帮助,国务卿希拉里用“同舟共济”来形容中美关系。然而,2009年底奥巴马总统访华之后,中美关系开始出现令国人不愉快的变化,且速度之快令人惊讶。从2010年初,美国对台军售、奥巴马在白宫会见达赖、谷歌事件、国会和行政当局交替打压人民币升值、南海问题等接二连三冲击中美关系,美国开始高调介入中国周边事务,不仅希拉里在东盟论坛上格外“关注”南海问题,甚至美国总统奥巴马也首次现身东亚峰会以示“关怀”,并将峰会的焦点引向海洋安全。华盛顿还积极拉拢印度牵制中国,并在钓鱼岛问题上偏袒日本。天安舰事件和延坪岛事件后,美国不仅巩固了本已有些松动的美韩军事同盟关系,更在黄海开展军演。同时,美国还设法改善与东盟的关系,强化美越、美菲以及美澳军事交流,希拉里还首次造访缅甸。中国正面临冷战以来从未有过的美国压力。

一

回顾过去十年,虽然中美两国分歧摩擦不断,但由于两国高层能从战略高度看待对方,双边关系始终有惊无险。中国将中美关系列为外交工作的“重中之重”,强调非对抗的合作原则。美国对中国的发展虽存有戒心,但并无阻止之意;奉行的是两面下注,“接触”与“防范”并进的策略。^①一方面防范中国,

^① 郝雨凡、张雁冬:《限制性接触:布什政府对华政策走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429-448页。

建立对中国可能的扩张进行有效约束的机制，但避免公开战略对抗；另一方面又保持并加强接触，深化经济交往，鼓励中国改革开放，希望能把中国纳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之中，使中国成为重要“利益攸关方”。一直到2010年前，美国对华政策的基调是强调“接触。”为此，美国也愿意顾及中国的核心利益而不轻易触碰中方底线。

然而，这种局面正发生重要变化。美国正从软硬兼施转向以硬为主，从两面下注转向更加强调全面防范甚至可能围堵，有惊无险正变得越来越有惊有险。这一转变显然不是选举年暂时的伴生现象。为什么会出现这一转变？美国对华强硬态势是否预示着美国对华遏制政策已经悄然启动？从目前种种迹象来看，美国对华强硬政策有常态化的趋势。导致这一转变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崛起的速度太快，超出了美国精英们的预想，而中国战略意图模糊以及近两年的一些做法也加深了美国对中国意图的猜疑。美国政界学界正在激烈辩论，到底应该怎样对付崛起中的中国，何种对华政策最能服务美国的长远利益？毫无疑问，美国仍要保持其在亚洲的领导者地位，而中国是最有可能挑战美国利益的国家。在如何应对中国挑战上，美国精英层正在分化，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开始倾向政策调整，认为美国应考虑采取措施，放缓中国崛起的速度，未雨绸缪；而过去的反华势力和新保守主义斗士们则更加积极地推动对华全面遏制，力图削弱中国，甚至颠覆中国现有体制。虽然尚无迹象显示美国政府已经开启全面遏制中国的对华政策，但今天的中美关系比十年前显然危险了很多，而且正呈现越来越危险的势头。

面对这一局面，中国该如何应对？中国外交的传统思维方式能否继续服务于中国的国家利益？冷战结束以来，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一直是中国外交的目标，和平发展与和谐世界是中国外交的理想，而“韬光养晦”一直是中国奉行的外交策略。应该说，这一策略适应上世纪90年代中国特定的外部环境和内政需要，并对实现当时的战略目标起到过权宜的作用。但20年后的今天，我们的利益和面临的问题已经截然不同。中国总体实力已经今非昔比，直追美国，中国的利益已快速走出亚洲，开始对美国的全球利益产生广泛而复杂的影响。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看法正急剧改变，国际格局也正经历深刻的结构性变化。国际制度改革的速度明显加快、美国全球支配地位已经松动，国际权力转

移已经开始，西方的信仰体系开始动摇，非西方国家的快速兴起正挑战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多极世界正伴随着金砖国家的崛起和一些区域性强国的出现而在磨合中形成。

在这一新的形势下，中国必须要有基于务实考量的外交大战略，用以统领今天的外交，维护今天的国家利益。中国如何看待现有国际体系？希望看到怎样的国际秩序？怎样看待美国？中国到底要什么？继续“韬光养晦”，继续模糊中国的战略意图，会使我国越来越被动。以大战略思维寻求大的战略突破，将中美关系放在整体外交大战略上思考，已经迫在眉睫。中共十六大报告曾预计21世纪头20年是中国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今天看来，这个预计长达20年的战略机遇期可能会由于美国“重返亚洲”的战略调整而提前结束。

二

那么，什么样的大战略能够维护日益扩展的中国国家利益？我们能否并怎样延长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外交大战略是国家总体发展战略的重要部分，需要有清晰明确的国家战略目标、假想对手、应对各种可能挑战及困难的对策以及如何达到战略目标的理念和步骤。美国人认为中国已经有了一套完整缜密的大战略，认定中国的目标就是要取代美国，称霸世界，所以担心中国崛起后会直接损害美国的利益。可中国并没有那样的战略构想，中国外交仍是被动反应型的，所设目标也仍然抽象笼统。中国的战略意图模糊已经产生了问题，如果继续模糊和滞后只会使中国更加被动。中国外交大战略的目标是保证中国在日趋复杂而可能恶化的外部环境下快速崛起，这一崛起并不是为实现对美国的全面赶超，称霸世界，而是要建设一个繁荣、富强、和谐、稳定的现代国家，使中国人民过上更加富足而有质量的生活。中国外交战略的具体目标是尽量利用外部资源、市场、技术和资金帮助中国崛起，同时尽量减少崛起的外部阻力。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崛起和国家现代化建设并不是一定会发生的历史必然，相当一些国家在现代化崛起的过程中以失败退场。因此，此战略目标必须依靠中国人的智慧和努力才有可能达到，而外交大战略就是为这一宏大战略目标服务的。

未来一段时间，影响中国战略目标实现的最大外部阻力是对中国崛起疑心加重的美国和可能愿意跟随美国防范甚至牵制中国的国家，以及越来越复杂诡谲的国际局势。过去20年，以政治民主化和经济市场化为主要特征的全球化，伴随着信息技术的革命性发展，产生了许多出人预料的后果，种族宗教纷争，民族主义、贫富差距和各种形式的社会运动已经使世界更加动荡，各国的利益更加错综复杂、犬牙交错，传统的敌友界限越来越模糊，安全观念和国家间关系呈现出新的特征。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外交大战略的假想战略对手应该是美国，也非美国莫属。美国正在成为影响中国崛起的最大外部因素，中国在世界各地走到哪里都会有美国的影子。我们的目标是要防止中美关系恶化，防止国际社会出现由美国牵头遏制中国甚至集体反华的势头。突破美国可能正在展开的对华遏制，以较小的成本，在逐渐增大的美国压力下崛起，实现从大国向强国再向超强国的角色蜕变。这种蜕变非常艰巨，要求中国必须有能力冷静分析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和日益突显的国内问题，及时转变思维，尽早形成一套以应对美国对华压力为中心，能够应付各种国际不利局面的完整而清晰的外交大战略；有步骤地突破美国可能正在构建的战略围堵，在复杂且愈加险恶的国际环境下，尽量减少来自美国的压力和各种外部阻力，主动而不是被动地向前走。同时巧妙地利用外部资源和技术壮大自己，实现快速而稳步的崛起，做到真正意义上的民富国强。

三

为此，中国整体外交大战略应有三个层次。

首先，中国外交战略的第一层次要集中力量应对主要对手，即如何制定巧妙、灵活而又富有创意和智慧的全面对美政策。这一政策即能有利于改善关系又不损害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必须认识到中美关系仍然是中国外交中最重要的双边关系，牵一发而动全局。美国虽然无法阻止中国的崛起，但却可以使中国的崛起更加困难，代价更大。关键是要有力争改善关系的明确对美政策基调，以合作而非对抗为主线。力求使美国回到对华接触、携手共进的战略认知

上。为此，中国不仅应动用各种人力、智力、经济、政治和外交资源，官民协力合作，消解美国对中国发展的猜疑和担心，更应从长计议，考虑美国的利益，照顾到美国的关注。高层互访应做到常态化，各种战略对话更要制度化、实质化。要让美国精英层了解中国领导层对世界局势、中美关系以及中国发展方向的看法，让更多美国民众了解今天中国的变化和面临的困难。争取要让美国精英层和普通民众认识到，中国崛起虽不一定是“双赢”，但不会也不应该是“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

中国要向美国不断表明，中国的长远战略目标绝不是挑战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中国不反对民主，不反对资本主义，更无意改变由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中国尊重美国的核心利益，愿意看到美国经济繁荣，实力上升而不是衰落。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李侃如认为，美国经济越是困难，社会问题越多，实力越是下降，美国对中国崛起的担忧会越大，对华所施压力也会越强。而如果美国经济复苏，实力和信心增强，反倒越会倾向与中国“接触”^①。中国应该欢迎美国发展，乐见美国强大。中国精英层不可在反对美国用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的观点看待中美关系的同时，也用同样的敌对观点看待美国。因为有何种观念，就会有何种行为，而有何种行为，就会有何种命运。如果我们用零和博弈来看待中美关系，那么我们的担忧一定会自我实现，美国一定会成为中国最凶恶的敌人。要让美国知道，中国满意做世界第二的位置，也愿意辅佐美国，善治国际体系，与美国一道在关心本国利益的同时，去关心并解决带有人类普遍性的全球问题。

目前，中美两国对彼此动机的猜疑正在加深，这似乎是两国利益不同所导致结构性矛盾的表现。一些美国学者以此推导出两国战略对抗不可避免。国内许多学者也认为，美国已经把中国当成敌手，中美新冷战帷幕已经拉开，中国必须丢掉幻想，积极迎战。然而，国际关系理论中对权力转移有着截然不同的两种观点。虽然一种观点认为，上升的强权一定会挑战传统强权，而最终结果一定是冲突甚至战争^②。但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如果传统强权和新兴强权都不感

① 采访李侃如 (Interview with Kenneth Lieberthal). March 17, 2012

②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WW. Norton, 2001, p.3.

到安全上的威胁，而且彼此能够考虑对方的利益，并试图满足对方的利益，传统强权也愿意分享权力，新兴强权在分享权力的同时也分享义务，并愿意接受现存国际秩序和行为规范，军事冲突是可以避免的。^①

应该意识到，西方建立并主导的国际体系和行为规则实际上与中国崛起的根本利益并不矛盾，过去30年间中国经济发展受益于美国竭力维系的这一体系。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是开放的，规矩是明确的，即使是超级大国也要遵守。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规则和联合国安理会的否决机制对超级大国也同样具有约束。对中国来说，融入现有体系，掌握游戏规则，对它做些必要的调整和改造而使其更好地为我所用，比推翻它，另起炉灶成本要小，好处要多。为此，中国没有必要挑战这一体系。

应该看到，美国虽已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并担忧中国崛起后的对美意图，但尚未把中国看成当下的敌人。中国只是潜在的敌手。这与当年冷战期间美苏关系截然不同。其间尚有相当大的余地去防止双边关系恶化。经过多年发展，中美经贸关系已相当广泛而紧密，众多受益者和商界精英们不会愿意看到中美对抗。同时，美国是一个多元社会，观点和利益并非铁板一块，存在着亲华、防华和反华等多种观点和派别。蓝领阶层、知识分子、企业主、军火商和金融银行家等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各异，虽有极端反华言论，但毕竟并不代表大多数人，而中美经济利益相互依存，已根深蒂固，中国崛起的巨大商机对美国人也仍具吸引力。

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中国虽然取得了骄人的成就，但总体实力与美国还有相当的差距，美国在高科技、高等教育、基础研发和创新、实体经济、金融体制和军工等领域优势明显。美国近年来的确出现贫富差距、社会不公、高失业率、财政赤字、债台高企、医疗体系扭曲等棘手国内问题，美国政党体制和宪法架构虽可以防止个人专权，但运作久了，也有低效甚至失灵的风

^① Ronald L. Tammen, Jack Kugler, Douglas Lemke et al., *Power Transitions: Strategies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Chatham House Publisher, 2000, pp.21-37; Tammen, "the Organski Legacy: A Fifty-Years Research Program,"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 34, 2008, p.318.

险^①。但美国制度中的纠错机制仍然存在，体制稳定性依然很强，社会仍充满活力，远没有一些人想象的那样已经日薄西山，走向衰败。过去半个世纪里，美国曾经历过三次大的民族忧虑。第一次是上世纪50年代后期，苏联发射的人造卫星（Sputnik）让美国精英层一度担心美国将被苏联超越；第二次忧虑是上世纪70年代初期由于全球石油危机、越战和美国的经济困难使得相当一些美国人担心美国在走下坡路，霸主地位将会被西欧所取代；尼克松总统提出的多极世界构想，反映了那一时期美国的焦虑。第三次是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美国精英层和民众又一度担心日本将在经济和技术方面超越美国而成为下一个超级大国。“敲打日本”（Japan Bashing）曾是80年代后期美国社会中一个鲜明的特征。但后来事实证明，美国人忧虑的噩梦都没有成为现实，美国的霸主地位并未被动摇，美国制度中的自我完善机制尚能纠正偏差，使得美国仍能继续保持领先优势^②，而曾经的竞争对手都因自身的问题而先后退场。今天美国精英层和民众对中国崛起的担忧可以说是半个世纪以来的第四次，中国的发展能否让美国的忧虑成真仍是一个历史的未知。对此，中国精英层必须有清醒的历史感。同时，也应意识到，美国经济低迷，对中国经济发展也没有好处，美国仍是中国的主要出口市场，而且中国还握有巨额的美债，如果美国也在经济上施压中国，中国发展面临的困难将会更加巨大。

其实，美国正在学习适应崛起了的中国。长期以来，美国对中国一直是俯视，是居高临下，而现在才刚刚开始学着平视中国。这使得相当一些美国人不舒服，不适应，而且美国精英层对中国政府有着根深蒂固的成见和不信任。学着适应“崛起的中国”注定是两国关系摩擦频繁的时期。然而，即使中美两国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会有许多磕磕碰碰，但两国已经是紧紧缠绕在一起。中美关系中一定是既有竞争又有合作，既争吵又谁都离不开谁。这是一种新型的关系，传统意义上对国际关系的理解已经不能很好地概况今天中美关系的实质。怎样管理中美之间这种日趋复杂的竞争关系，在冲突中合作，在竞争中共存，

① George Packer, "Broken Contract, Inequality and American Decline", *Foreign Affairs*, November/December, 2011, pp. 20-31.

② Fareed Zakaria, *The Post American World*, New York: WW. Norton, 2008, p. 210.

使其不至于脱轨，需要智慧；特别是在两国民间社会力量越来越相互猜疑，又越来越能影响政策制定的今天。^①但两国关系的前途是可控的，增加互信的基础是有的，如果智慧地处置，是可以避免中美关系恶化的。当然这需要两国官方、学界、媒体和民间共同努力，使两国关系提升到真正的“战略伙伴”关系的水平。

毫无疑问，美国的确是中国国家安全的最大潜在威胁，中国外交大战略的战术目标之一就是防止美国成为中国国家安全的真正威胁。这要求中国要有对美的两手策略，既要接触合作，防止过早成为美国的战略敌手，又要积极反围堵，建立强大的国内和国际机制，对内防范美国可能的渗透和情报收集，对外反制美国压力并防止出现不利于我的局面，维护国家的核心利益。但一定要以合作为主，以确保深化接触为前提。对此，中国要尽快形成一套宽泛灵活的对美政策机制，能够同时包容两种截然不同的政策选择，并可从容调配，左右逢源。

当下美国对华政策趋于强硬，固然有美方的原因和问题，但中方也有值得反思的地方。中国对外战略不清晰的确让相当多的美国人担忧中国未来的战略意图，中国传统文化中喜欢深藏不露，以为不说，让对手摸不着底，才会对我有利。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的实力有限，中国战略动机模糊，国际社会尚不介意，而今天中国实力已今非昔比这时仍然战略动机不愿示人的话，外人一定会往最坏处去想，而且，中国最近的一些做法也容易造成误解。最近逐渐高涨的民族自豪感和对美国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后的国际格局过分乐观的判断，导致一些人大谈“赶超在即”，大谈“北京共识”取代“华盛顿共识”^②。中国在2010年的一些外交动作也过于张扬。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崛起的道路漫长且艰难，切不可过早飘飘然。西方是出现问题，但我们尚不到总结成功经验的时候。必须花大气力，做好自己的事情。改善中美关系，多强调两国合作

① 郝雨凡、林甦：《中国外交决策：开放与多元的社会因素分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9-29页；郝雨凡、张雁冬著：《无形的手：与美国中国问题专家点评中美关系》，北京：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

② Kenneth Lieberthal and Wang Jisi, *Addressing US-China Strategic Distrust*, John Thornton China Center at Brookings Institution, 2012, pp.8-28.

的空间和必要，积极扩展经济、军事和文化等多个领域的交流，增进互信，缓和紧张。坚持“斗而不破，”“争而有度”，防止中美关系滑向不可逆转的全面敌对状态。

四

中国外交整体战略思考的第二个层次是如何在中间地带国家不断扩大中国的经济影响力，顺应国际局势变化的脉搏，改善这些国家对中国的态度，通过政治、经济和外交手段，将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融入中国的经济势力范围。与过去相比，今天的中美关系越来越多地涉及到第三方。

中国在世界上的崛起应该从亚洲开始。中国应在东南亚、东北亚、中亚、南亚和西亚建立巩固的朋友圈，甚至考虑同一些国家建立盟友关系。用中国商品、市场、技术和资金，去影响周边国家，拉近周边国家；并逐级把中国的影响扩展到中东、非洲和拉丁美洲，在世界范围内寻求并扩大朋友圈。其实，中国已经是周边国家包括澳大利亚等国的最大贸易伙伴，许多周边国家并不愿意美国强迫他们“选边站”。他们希望与中国保持良好的关系，在经济上受惠中国的崛起和发展。在中间地带的争夺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零和博弈的竞争关系。但中国和美国的竞争主要表现在经济领域，中国手中握有经济牌，而美国手中握有军事安全牌，还有一定的价值观牌。中国并不见得处于劣势。而近年来方兴未艾的地区经贸一体化的趋势，对中国有利。近两年来由于美国的“巧实力”运作，有些周边国家与中国的关系出现紧张，中国的战略不清晰也造成周边国家对中国发展走向和战略意图的猜疑和担忧，助长了“中国威胁论”的蔓延。中国要在战略高度上意识到构建与周边国家的战略互信，构建中国关系网和扩大中国势力范围的重要性，尽快提高中国在中间地带的战略影响力。

中国要向亚洲国家乃至全世界表明，中国要做负责任的世界级领袖，采取的是与各国合作的策略，开疆扩土不是中国的战略需求，和平的国际环境尤其是和平的周边环境对中国的发展最为重要。国际社会更愿意看中国怎样做，而不是怎么说。中国不仅要说不，更要用行动来宣示，中国已经是世界级大国，而且是负责任的大国，有能力维持一个和平稳定的东亚区域秩序，为此中国也愿

意承担义务。但同时，中国也不能一味迁就，为了展示和平诚意而牺牲国家的根本利益。在南海问题上要政策具体而且灵活，当然不可让周边国家蚕食中国的领土，但也要从战略高度审视我们每一个行动的长远后果，不到万不得已，不可动用军事力量。如果迫不得已不得不动武，也一定要做足国际舆论和公关工作，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出师有名。应考虑共同开发有争议岛屿，同时改善了中美关系也能防止美国过早偏袒中国南海的周边国家。

中国也应检讨奉行多年的不结盟政策，主动出击，而不是被动防御。在巩固传统友谊的同时，积极争取中间地带的新朋友。中国应高度重视与俄罗斯、巴基斯坦和非洲一些友好国家的传统关系，要从战略高度去改善和巩固；同时也要在大战略的框架下思考并协调好与日本和印度等周边大国的关系，同时也要处理好与菲律宾、越南等与中国有重要领土主权争端国家的关系，防止美国蓄意利用，滋生事端。虽然在领土主权问题上不可让步，但与这些国家的关系牵扯到许多方面，尚有空间稳定并改善双边关系；同时还要争取欧盟、澳大利亚、东盟以及拉美国家在中美竞争中保持中立，综合运用援助、经贸和政治支持以及在国际组织中的影响力，在国际舞台上巧妙斡旋，捕捉各种机会，见缝插针，从战略高度削弱甚至突破美国可能意图构建的战略包围。在一定意义上讲，亚洲将是未来一段时间中美竞争的主要场地。因此，如何处理好中国与亚洲国家关系考验着北京的外交智慧。中国可以通过自身的发展和与周边国家的经济整合，循序渐进地取得亚洲的领导权。

近年来，中国国内的经济越来越依赖海外能源供给，而全球能源市场的稳定和运输畅通一直是美国核心的战略利益，中美两国在世界范围内的能源竞争开始显现，中国不仅在非洲、中亚和中东寻求新的稳定能源供给，而且也已经进入了美国传统的势力范围，在拉美的委内瑞拉和巴西等国大手笔地投资能源项目，甚至开始从加拿大买油。这已经引起了美国的高度警觉，担心中国的高调介入会导致全球石油价格的扭曲和市场的超常波动。而中国与苏丹和伊朗的能源合作，已经在影响美国在该地区的战略利益。中国应向美国表明，中国的海外能源供给也是中国的核心利益，希望美国照顾到中国的能源需求，把中美能源竞争限定在正常商业活动的范围内，切勿将其政治化。而中国也应照顾到美国的能源战略利益，尽量避免中美能源竞争加剧，导致双边关系因此而

恶化。

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普及，外交平民化的趋势开始显现，各国政府不得不适应社会公众更大知情权的要求并对民意作出回应，非政府组织（NGO）在国际关系中的发言权得到提升，信息的传播方式也削弱了国家权力对外交领域的传统垄断，中国的公共外交应提上日程，应通过多种渠道和手段影响国际社会和邻国民众对中国的看法。这不仅会降低周边邻国对中国崛起的担忧，平滑中国崛起的外部阻力，而且也将帮助国际社会全面认识中国，尽快接纳崛起了的中国。

今天，中国外交面临的问题不仅复杂多样，而且涉及的利益也经常相互矛盾，这不仅急需整体的大战略思考，也要求中国尽快建立能够在两个层次上协调对外大战略的部门，应尽快建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统一协调不同部门和地区的不同利益。外交部、国安部、中联部、军队、商务部、教育部、科技部、能源部、海洋局、新闻办、环保局甚至央行等不同部门的对美和对周边国家的考量应统一纳入大框架下思考，在外交大战略上更需要顶层设计。这一部门不仅要有具备战略眼光的决策领导者，还要有顶尖学者和具有多年实践经验的外交人才，可以洞察时代发展脉络，提出具有创新意义的理念和政策。

五

大战略的第三个层次在国内。外交不仅服务于国内的发展，外交战略也取决于国内的发展，因为国家的实力来自内部。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崛起面临的巨大挑战可能还不是美国，而是国内。这种来自国内的挑战，甚至超越美国施以的外在压力。可以说，中国的崛起能否持续，关键取决于国内的改革、转型和提升。落实民富国强和提升总现代化程度，才是实现国家总体战略目标的全部意义。不仅中国大战略的基本目标是崛起，中国大战略的前两个层次也要求中国迅速提升中国综合实力来提升对外战略影响力。而当前提升战略影响力的关键是提升中国基础经济实力和与之配套的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因为中国经济发展已经到了关键的节点，需要从大战略的高度来看待。

在当今时代，国家已经无法关起门来进行现代化建设，必须继续与世界保

持深度接触。因此，大战略中的国内部分要求我们必须两条腿走路，内外配合，在软硬两方面推进。

硬件建设包含科技和军事两大领域。西方多年对华武器和高科技封锁已经证明，军工等高科技领域的发展不能指望西方，只能依靠自己。中国需要利用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在新能源、新材料、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空间技术和尖端武器装备等重要领域有所突破，并培育出能够持久创新的机制。军事上，要有配套的太空战略、海洋战略和网络战略，以能够增加美国军事打击成本，威慑其动武冲动为短期目标，最终达到可以抗衡美国和冲破美国可能设置的军事包围圈，并能在可能发生的军事冲突中维护国家安全和领土主权完整、满足国内能源需求的海外供给等核心国家利益。这些硬实力越提升，中国的国家利益越能得到保障。

软的方面包括进一步深化经济改革和完善社会制度建设两大领域。由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虽然有集中力量办大事、高效决策的优势，但也会造成经济和社会结构失衡、公共产品缺失、社会不公、贪污腐败和特殊利益集团等问题。在经济上，中国持续30年的高速增长已经走入困难阶段，过去廉价劳力、原材料、资本、技术引进和制度性等后发优势都已经基本释放完毕，要想保持高速增长需要进一步加大改革力度，在价格、国有企业、金融体制等领域进一步引入市场机制。中国的经济改革在取得惊人成就的同时也产生了几个严重的结构性失衡：收入分配不均，基尼系数已经从1981年的0.31上升到2008年的0.47；家庭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由1979年50%降至2008年的35%^①，而固定资产投资却从国内生产总值的30%上升到45%；外汇储备过大，贸易顺差从零增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8.8%（2007）；资本回报率过低，各级政府膨胀过快，国企效率不彰，而民营企业受限太多，融资艰难，加上环境污染严重，资源紧缺，创新力不足等严峻挑战，使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并不乐观。中国要以优化经济结构为目标，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从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向高精集约型经济转变，从以高储蓄的投资出口导向型向内需拉动型转变，

① Perkins & Rawski, "Forecasting China's Economic Growth to 2025" in *China's Great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ed. L. Brandt and T.G. Rawski,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829-885.

在全球市场竞争中推动中国产业升级，技术进步，降低能耗，实现经济良性可持续增长。同时，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融合程度已经很高，中国需要充分利用外汇储备和在现有国际经济体系中的贸易优势，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积极参与改革国际金融体系，争取更多的规则制定权，为国家整体发展战略利益服务。

中国的社会治理能力亟待提升，过去30年改革开放所伴生的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正在集中。随着人民生活的改善，民众的各种需求也在增加，必须改变传统的治理方式，解决与经济增长相伴而生的社会不公问题，既包括财富分配的不公，也包括非经济领域的社会不公。民众对教育、就业甚至各种资源获取机会的不公，对一些行业如银行、电信、能源等垄断暴利，对医疗、住房、社会救助和保障等社会服务体系的不足越来越不满，对司法体系、税收及政府支出透明程度的不信任也在增加。严重的社会不公和腐败、官权与民权的失衡以及权力和资本相结合形成的特殊利益集团很可能引起民愤，引发社会动荡，进而造成中国崛起进程的放缓乃至中断。为此，中国需要进一步推进国内治理体制改革，完善社会制度建设，从社会公正、公共福利、人文关怀等方面全方位提升社会治理水平。既要在新旧体制转换中受益不多甚至利益受损的群体进行关照甚至补偿，保持不同群体、不同地区在转型中均衡受益，又要尽快建设一种合理有效的、与市场经济相匹配，以法治为基础的，具备民主政体反腐功能、又能照顾到社会公平正义的社会治理机制和新型价值体系，寻找到中国社会不同群体的共同利益交集点，实现社会公平、平等、效率和发展等目标的协调共进。这应是中国大战略的重要部分。内部和谐稳固，就不怕外部风急浪高，即使美国由于无法摆脱困境，而加大遏制和围堵中国的压力，也无法对全国人心稳定蒸蒸日上的中国造成什么影响。在国内层次的“有所作为”，只会加快中国崛起，也必定有助于增加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尊重，增加中国的声望、信誉以及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从而减轻外部阻力，帮助中国国内发展和真正崛起。